

洋麦进口与近代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发展

王 强

(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8)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利用世界麦产增加及麦价下跌的时机,大规模进口洋麦,生产原料出现从以国麦为主到以洋麦为主的结构性转变,也因此获得显著的成本优势,与进口洋粉展开竞争,并挤压了其它地区面粉工业的市场空间。但过度依赖洋麦以及政府调控在国麦产销和洋麦进口方面的缺位,强化了机制面粉工业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依附性,这成为导致1930年代上海机制面粉工业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洋麦与近代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的关系,是近代民族工业脱离本国农业生产、过度依赖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洋麦;机制面粉业;粮食贸易;近代农业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1-0077-12

The Import of Foreign Whea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sm Flour Industry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Shanghai

WANG Qiang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 the mechanism flour industry in Shanghai took advantage of the world wheat production increased and the price of wheat fell, imported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 wheat. The production materials changed from the native wheat to the foreign wheat, helped the mechanism flour industry gain significant cost advantages, compete with imported foreign flour, and squeeze the market space of flour industry in many cities. However,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foreign wheat and the lack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n native wheat production and import of foreign wheat strengthened the dependence of the mechanism flour industry on the capitalist world market, it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the decline of Shanghai mechanism flour industry in 1930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wheat and modern Shanghai mechanism flour industry is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modern national industry's separation from nati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world wheat market.

Key words: foreign wheat; mechanism flour industry; grain trade;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agriculture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小麦产量增加、麦价下跌的大背景下,洋麦大量输入,取代国产小麦成为近代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的主要原料来源。洋麦在生产原料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最高达九成左右,平均在半数以上,洋麦进口彻底改变了机制面粉工业以国麦为主的原有原料结构。利用洋麦的高品质与低

【收稿日期】2021-06-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上海银钱业利率波动机制研究”(17BZS140);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项目

【作者简介】王强(1979-),男,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

价格优势,上海机制面粉工业规模和产量迅速增长,并挤压了内地面粉业的市场空间。但过度依赖洋麦,与本国小麦生产脱节,也使上海机制面粉业依附于国际小麦市场,受制于世界小麦供应与市场价格波动,增加了自身发展的外源性风险。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面粉工业中心,作为原料消化的洋麦往往占全国洋麦进口总量的80%以上^①,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对洋麦的依赖,在全国有一定的代表性。以上海机制面粉工业为中心,从中外经济互动的视野审视近代民族工业与海外原料市场的关系,无疑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近代工业发展复杂性的认识^②。

一、洋麦进口与面粉工业原料结构变化

机制面粉工业为近代中国出现的新式工业,传统社会的所谓面粉业,“不过乡农以人畜之力,为小规模之磨面,以销售于本地市场而已”^③。近代机制面粉工业肇始于上海,1897年上海英商增裕面粉厂开业,随着面粉需求的不断扩大,嗣后又有阜丰、华兴、裕丰、申大等机制面粉厂相继成立。机制面粉工业虽然起步较晚,但进入20世纪之后发展迅速,至1920年代初,上海一埠已有机制面粉厂20家,日生产能力达9.4万袋,占全国日生产能力的30.2%^④。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快速扩张,1914—1921年,上海各面粉企业年均设计产能达1.2亿包,用麦量800万担左右,产能比一战之前的平均年产量增长约一倍^⑤。至1930年代初,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在产业规模与面粉产量上皆占全国的50%左右,年消耗小麦约1500万担^⑥,规模与产能的迅速扩张,对原料供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21年之前,中国洋麦进口数量极少,每年进口量仅有数千担,1917年最多时也未超过5000担^⑦,上海各面粉企业的原料供应,基本依靠国产小麦。1913—1921年,上海输入国产小麦数量分别为29.3万担、37.6万担、127.2万担、174.8万担、227.9万担、275.7万担、237.0万担和149.8万担^⑧。然而国产小麦的供应严重不足,尽管面粉企业在邻近的苏、皖、浙等省麦产区尽力收买,但通常情况下仅能供三四个月之用,即便是丰年收买量较大时,也仅够五六个月的生产所需,其余大半年时间面粉企业处于无麦可用的状态^⑨。如何能够获得充足的原料供应,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是上海机制面粉工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进入1920年代,各国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世界小麦产量较一战之前大为增加。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四个主要产麦国的总产量在战后显著增长,1926年达到5.4亿吨,较战前3.1亿吨的平均年产量增长了74.2%^⑩。在产量大增的刺激下,美国1926年小麦出口比战前增加了220%,加拿大增加

① 上海市粮食局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第138页。

② 相关的研究有上海市粮食局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林刚:《对1927—1937年间中国机器面粉工业的若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徐畅:《近代中国国内的粮食流通与粮食进口》,《东岳论丛》2011年第11期;纪辛:《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的粮食进口》,《近代中国》1996年第1期;黄静:《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小麦进口问题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上述研究分别对近代面粉工业发展脉络、国内粮食流通格局变迁、近代粮食进口规模与来源变化等问题进行了考察,然在近代机制面粉工业发展对洋麦的过度依赖及其原料结构变化的原因、面粉工业与世界小麦市场的关系等方面尤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和必要。

③ 薛继盛:《中国面粉业之前途》,《申报》1924年5月25日。

④ 上海市粮食局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43页。

⑤ 上海市粮食局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120页。

⑥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38页。

⑦ 巫宝三:《中国粮食对外贸易其地位趋势及变迁之原因(1912—1931)》,社会调查所,1934年,附录第15表。

⑧ 巫宝三:《中国粮食对外贸易其地位趋势及变迁之原因(1912—1931)》,第43页。

⑨ 社会经济调查所编:《上海麦粉市场调查》,社会经济调查所,1935年,第15页。

⑩ 《世界小麦生产数量表》,《面粉工业》1948年第2卷第1期。

150%,阿根廷与澳洲各增加50%左右^①。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上的小麦价格不断下跌。192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逐渐陷入大萧条,市场恐慌,失业增加,国际小麦市场的订单需求大幅萎缩,各国积存的小麦数量日渐攀升,世界小麦进入过剩状态^②,以美国和加拿大为首,麦价一路狂跌,美国芝加哥出口量最大的二号冬麦的价格由1927年的每英斗^③1.37美元跌至1930年的0.96美元,加拿大温尼伯一号小麦则由每英斗1.48美元跌至0.95美元^④,不仅美、加两国如此,世界小麦平均价格也大幅下滑,由1926年每英斗1.46美元跌至1930年的0.65美元,四年跌幅高达55.5%^⑤。

世界小麦价格的不断下跌,给上海机制面粉工业提供了充足原料的机会。从1921年开始,中国的洋麦进口规模持续扩大。从进口数量上看,1921年全国洋麦进口8.1万关担,1924年为514.5万关担,1929年为566.4万关担,1931年增长至2277.3万关担,比1921年增长了181.1%^⑥。从洋麦在全国粮食进口总额的比重上看,1916年洋麦进口仅占全国粮食进口总量的0.4%,1921年开始逐渐增长,1922年占3.1%,1926年13.2%,1931年最高时占47.8%,之后虽有所下降,1933年依然占32.7%^⑦,成为最大宗的进口粮食类别。

从来源上看,1920年代初,进口洋麦“以美国为大宗,约占半数以上,其次则加拿大,占三成,再次则为澳洲、新西兰,不及二成”^⑧。1920年代后期,加拿大小麦上升为第一位,澳洲小麦输入亦逐年增加,到1929年,“中国进口小麦中,澳货一跃而居第二位”^⑨。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棉麦借款协议,美国小麦对华输出大幅增加,再次成为进口小麦的最大来源国。1935年后,澳洲小麦居首位,占上海进口洋麦总量的85%左右^⑩。总体上看,虽然各国对华小麦输出规模前后有所变化,但小麦成为四国对华贸易增长最快的出口商品是不争的事实。

观察这些洋麦的去向,其中的绝大部分流向了上海。1921年以后,上海一埠进口的洋麦平均占全国洋麦进口量的八成以上,最高年份达97.8%,1921—1936年上海占全国进口洋麦总额的比例参见表1。

表1 上海进口洋麦及其占全国进口总额比例(1921—1936) (单位:关担)

年份	全国进口	上海进口	占比	年份	全国进口	上海进口	占比
1921	81,346	67,971	83.6%	1929	5,663,846	5,464,079	96.5%
1922	873,142	831,954	95.3%	1930	2,762,240	2,391,154	86.6%
1923	2,595,190	2,225,464	85.8%	1931	22,773,424	19,614,731	86.1%
1924	5,145,367	5,047,793	98.1%	1932	15,095,698	11,021,392	73.0%
1925	700,117	665,279	95.0%	1933	10,714,638	8,580,009	80.1%
1926	4,156,378	4,065,655	97.8%	1934	4,649,419	4,082,282	87.8%
1927	1,690,155	1,646,451	97.4%	1935	5,209,087	4,506,384	86.5%
1928	903,088	789,806	87.5%	1936	1,168,093	1,108,872	94.9%

资料来源:陈伯庄:《小麦及面粉》,交通大学研究所,1936年,第31页;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16—117页。

① 《战前五年与战后五年世界小麦与面粉业之概观》,《上海总商会月报》1926年第6卷第1号。

② 克麦莱:《世界小麦问题研究》,《复兴月刊》1933年第2卷第2期。

③ 英制计量单位,即蒲式耳(Bushel),相当于80磅。

④ 王维骊:《世界小麦之产销及贸易状况》,《国际贸易导报》1932年第4卷第6号。

⑤ 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编:《小麦统计》,全国经济委员会,1934年,第10页。

⑥ 上海市粮食局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58页。

⑦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第96页。

⑧ 执无:《今日中国民食问题中之小麦及其制粉》,《银行月刊》1927年第7卷第2期。

⑨ 《澳货进口大增》,《国际贸易周报》1932年第3卷第11期。

⑩ 啸天:《中国麦产与上海小麦市场》,《日用经济》1941年第3卷第12期。

从表1的统计可见,上海始终是最大的洋麦消费城市。从用途上观察,这些进口洋麦几乎“全系本埠厂家及经纪商所抛订”,供上海机制面粉工业作为原料使用。上海各大面粉企业对洋麦的依赖逐渐增长,以上海最大的阜丰面粉公司为例,该厂从1922年开始采办洋麦,至1936年的15年间,洋麦占该厂小麦采购总量的六成左右^①。上海福新面粉公司的记录也显示,1931—1933年该厂使用洋麦每年达710万担以上,占全年用麦量的82.2%,国麦占比不及两成^②。从机制面粉工业使用洋麦的整体情况看,1922年洋麦占原料需求总量的18.4%,1926年为33.1%,1929年为44.5%,1933年最高达78.7%,此后虽有下降,1935年仍高达50.3%^③。

我们可以从上海《申报》一则关于洋麦问题的报道中感受机制面粉工业原料来源的巨大转变:

“回忆民元时,只四川一省到申之小麦,约有三四十万之巨,彼时上海粉厂正在发轫,麦廉粉贵,得造成勃兴之局面,嗣后河南、湖北两省麦产,集中汉口,络绎来申,皖北一带,既为麦产之丰饶之区,又大都以上海为尾间,宁只二十年之后,四川无论矣,即汉口麦亦几绝迹,皖麦由运河长江来者,亦不及民十以前之畅旺,积此种种,本埠之制粉厂,除新麦时期尚足应付外,否则即须仰给于洋麦,时至今日,竟形成非洋麦进口,不能维持之惶恐。”^④

洋麦对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从洋麦进口数量波动与机制面粉工业的开工率之间的对比上窥其端倪,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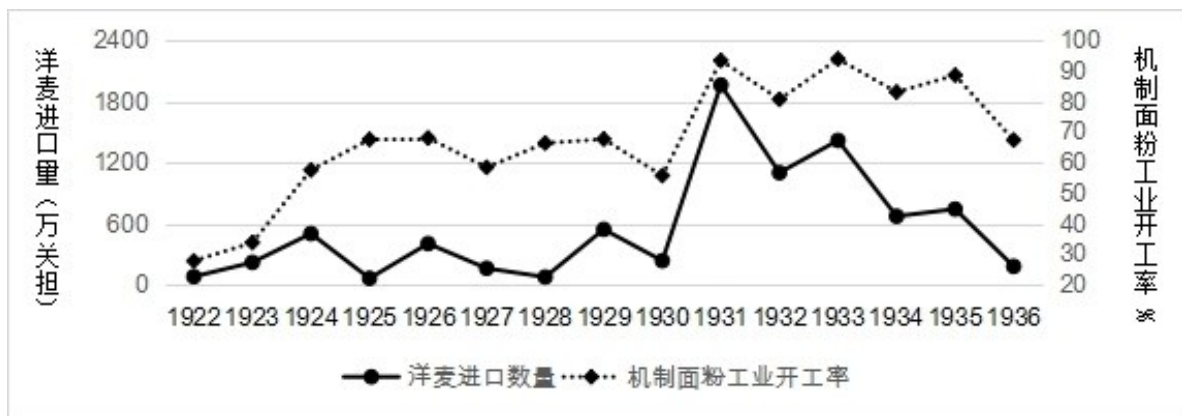


图1 洋麦进口与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开工率比较(1922—1936)

资料来源:上海市粮食局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第143页。

根据图1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的开工率变化基本与洋麦进口的波动是一致的,洋麦进口增长,开工率提高,洋麦进口下降,开工率亦随之而降低。整体上看,上海各面粉企业在1922—1930年,虽然开工率有所提升,但由于此时洋麦进口数量刚刚开始起色,平均开工率仅有55.9%,1931年之后,洋麦进口大幅增长,开工率也相应地有显著提高,1931年洋麦进口最多的年份,开工率接近100%,1932至1936年开工率都在80%以上。平均而言,1922—1936年的年均开工率为67.4%,明显高于前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洋麦进口几近断绝,抗战胜利后,虽然洋麦进口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由于南京政府在上海实施粮食统制政策,小麦的市场流通被严格管制,洋麦不再是影响面粉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①《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717页。

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74页。

③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第138页。

④《定购洋麦之办法》,《申报》1932年12月7日。

二、购销洋麦形成的竞争优势

大规模购销洋麦,使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相较于济南、天津、汉口等其他城市的面粉工业获得显著的市场优势。

首先,优质、稳定的洋麦供应有助于面粉企业更精准地控制生产成本。受粉、麦差价日渐缩小以及大规模洋粉进口的影响,上海面粉企业利润率普遍走低,1922—1936年间每包面粉的平均利润仅为0.15元,最低时仅有0.102元^①,即生产一包面粉的利润只有一角有余。1930年代初,阜丰面粉公司生产一包面粉的纯利最低时仅为0.024元,福新系统的几家面粉厂平均利润率仅为2%~3%左右^②。极低的利润率意味着如果小麦的品质或供应能力一旦发生变动,面粉企业就可能陷入亏损,因此,稳定的优质的小麦供应对上海面粉企业能否在较低的利润率之下保持持续盈利十分重要。

比较洋麦与国麦的出粉率,洋麦明显优于国麦。洋麦的麦粒粗大,而且比较均匀,相同容积下,洋麦重量往往较国麦为高,“美麦一石,重有205.5磅;澳洲麦一石,重约206磅;而中国麦一石,只有166磅,其重量较美麦轻39.5磅,比澳麦轻40磅”^③。每100斤美国、澳大利亚小麦能加工出80斤甚至更多的面粉,而同样重量的中国小麦只能出粉70斤左右,这样一来,出产同等重量的面粉,国麦较洋麦要多用7%以上的原料^④。洋麦磨出的面粉优等率也高于国麦,据统计,上海面粉企业用国麦磨成的面粉中仅有80%为优质的二等粉,美国和加拿大小麦则90%以上为二等粉^⑤。对此,上海《申报》在谈到影响面粉工业选择麦源的诸多因素时曾评论道:“苟非麦之品质极为可靠,断不能在极低纯益,极狭窄范围之内,操算如此精密。”^⑥

但仅仅从小麦出粉率的角度解释上海面粉企业采用洋麦的动机显然不够,因为多数情况下,洋麦进口价格是高于国麦采购价格的,那么,上海面粉企业为什么愿意选用价格更高的洋麦呢?一般而言,面粉企业是否愿意购买洋麦,主要决定于两种比较价格:一种是国麦与洋麦价格比较的差度,一种是洋麦与国麦所出面粉价格比较的差度。假使这两种差度有利于厂方利润,则购用洋麦自然比较多,否则就用得少。自洋麦大规模进口以来,洋麦、国麦价格及其与麦粉价格之差度统计,参见表2:

年份	洋麦价格	国麦价格	洋麦与国麦 价格之差度	洋麦每担所出 面粉价格①	国麦每担所出 面粉价格②	洋麦与国麦所出 面粉价格之差度③
1927	5.28	4.97	+0.31	5.30	4.64	+0.66
1928	4.78	4.43	+0.35	4.80	4.20	+0.60
1929	4.72	4.30	+0.42	4.91	4.30	+0.61
1930	5.30	4.93	+0.37	5.36	4.69	+0.67
1931	4.39	4.11	+0.28	4.64	4.06	+0.58
1932	3.98	3.67	+0.31	4.23	3.70	+0.53
1933	3.49	3.25	+0.24	3.64	3.19	+0.45

资料来源:张心一:《上海米麦价格与外国米麦进口之关系》,《中行月刊》1934年第9卷第1期。

说明:①按每担洋麦平均出粉80斤计算;②按每担国麦平均出粉70斤计算;③每担洋麦所出面粉价格与每担国麦所出面粉价格之差数。

① 上海市粮食局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146页。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编:《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37页。

③ 《水灾声中之民食状况》,《申报》1931年8月9日。

④ 许道夫:《中国近代粮食经济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第182页。

⑤ 那安:《上海之面粉工业与中国之国外小麦贸易》,《建国月刊》1929年第2卷第2期。

⑥ 《上海面粉业概况(续)》,《申报》1935年12月26日。

由于小麦必须制成面粉,才能在市场出售,因此面粉价格与小麦原料价格的关系,是面粉企业决定麦源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洋麦比国麦的价格高得愈多,面粉企业采用洋麦的可能愈小,面粉的价格较洋麦的价格高得愈多,则面粉工业采用洋麦的比例逾大。根据表2的统计,洋麦的价格始终高于国麦,1929年最高时两者相差达0.42元之多,但为什么上海面粉工业宁愿选择价格较高的洋麦呢?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容忽略,那就是洋麦出粉率高于国麦出粉率,如若以洋麦平均每担出粉80斤,国麦平均每担出粉70斤计算,洋麦每担所出面粉价格始终高于国麦每担所出面粉价格,1930年最高时达到0.67元,也即虽然洋麦价格相对较高,但由于其出粉率远高于国麦,面粉工业反而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洋麦与国麦所出面粉价格之差度越大,面粉工业越愿意使用洋麦。如果再把洋麦出粉的优等率高于国麦考虑进去,这个趋势则更加明显。观察上述统计,1920年代中后期,洋麦平均每担所出面粉价格超出国麦每担所出面粉价格在0.60元以上,这就是这一时期洋麦进口量不断攀升的原因,1933年之后,由于外国小麦价格逐渐提高,使用洋麦所能获得价格差度越来越小,洋麦进口量也随之越来越小。因此从上述规律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上海面粉企业大规模采用洋麦,归根结底是缘于采用洋麦能获得更大的利润。

其次,大量采用洋麦进一步强化了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相对于内地面粉工业的比较优势。上海凭借便利的港口条件、雄厚的资本支持和发达的期货市场,在运输、融资、面粉期货交易等方面拥有内地粉厂不具备的洋麦采购条件。上海面粉企业产能高,洋麦进口数量庞大,规模化采购洋麦是内地面粉企业难以企及的。如1929年1—5月,上海的茂新、福新等面粉厂,短短5个月间在美国订购之小麦总价值达6000万元,这些小麦由英商轮船公司承运,分60船运送来华,一条船常在七八千吨之间,仅此一项交易,每月就有6万~7万吨美麦抵沪^①,如此巨额的订单,内地面粉企业往往无力承购,即便由上海中转,也因费用大、成本高,并不划算,故内地面粉企业购用洋麦者为数极少^②。

由于采购量大,外国洋行常常允许上海的面粉企业可以延期三四个月以后结算货款^③,在市场销路畅旺时期,三四个月的时间足够面粉企业完成晾晒加工、市场抛售、收回货款的全过程,也即意味着面粉企业无需额外在原料采购上投入资金,就可以完成一个从生产到销售的循环,极大地减轻了面粉企业自身的资金压力和成本。此外,1921年上海面粉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洋麦的品质与成色较为稳定,到货又较为准时,面粉企业基本能按预定计划开工生产,因此洋麦磨成的面粉在交易所很受欢迎,上海的面粉企业甚至可以在面粉生产之前就以期贷的形式回笼部分资金^④,这些都是内地粉厂无法具备的市场优势。

最后,洋麦的大量涌入,也大大增强了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在国内小麦市场上的话语权。因为有了更多麦源选择,面粉企业不必如1920年代之前那样完全依赖国产小麦,这一方面提高了面粉企业在国产小麦采购过程中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也无形中拉低了上海粮食市场上国产小麦的交易价格(见表3)。

表3 1921—1935年国内主要城市的中等品小麦平均价格比较 (单位:元/担)

年份	上海	天津	沈阳	济南	汉口	广州
1921	4.85	8.80	11.68	18.60	5.47	6.31
1923	5.14	9.43	10.53	22.74	6.95	6.50
1925	5.76	10.25	15.95	22.99	7.45	7.60
1927	6.22	11.11	17.33	27.29	8.83	7.37
1929	5.87	11.69	22.54	28.10	—	7.93

①《巨值美麦分期运沪》,《申报》1929年3月13日。

② 陈伯庄:《小麦及面粉》,交通大学研究所,1936年,第31页。

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374页。

④ 陈伯庄:《小麦及面粉》,第32页。

续表3

1931	4.63	9.96	20.22	26.34	7.33	——
1933	3.63	7.69	——	25.66	5.92	——
1935	4.01	6.78	——	26.53	6.33	5.96

资料来源:《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248页;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1页;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0页。

根据上表统计,除极个别年份外,上海一埠的小麦价格较其他城市为低。以1927年为例,该年上海中等品小麦的平均价格为每担6.22元,天津为11.11元,比上海高78.6%,沈阳17.33元,济南27.29元,分别是上海的2.8倍和4.4倍,即便是面粉消费有限、麦价较低的广州,也比上海高出18.5%。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各地的麦价差距并不完全是洋麦进口导致的结果,它还与当地小麦生产、运输条件、市场消费能力等因素有关,但如若从沿海与内地的区域差异方面观察,我们会发现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城市的麦价要比汉口、济南、沈阳等内地城市的麦价要低,这显然是由于当地机制面粉企业大规模进口洋麦,国产小麦采购数量减少,导致当地粮食市场上的国产小麦价格趋于疲软的结果。

大规模进口优质洋麦使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在全国同业中获得相对的成本与价格优势。据调查,1933年上海阜丰面粉厂平均每包面粉的原料成本为0.15元,山东济南成丰面粉厂为0.20元,河南新乡通丰面粉厂则高达0.60元^①。在上海面粉销路最大的天津市场,上海面粉的售价,通常低于当地和外埠的产品,有时甚至低于削价倾销的洋粉^②。价格优势使上海面粉在天津市场受到普遍欢迎,在天津每年约1600多万包的交易量中,约60%为上海粉,15%为天津与济南粉,约24%为进口洋粉^③。上海面粉之所以能够在天津这个国内最大的面粉消费市场站稳根基,不得不说与上海机制面粉企业大量购销洋麦降低生产成本有很大关系。

三、原料本土化视野下国产小麦的产销问题

如前所述,在洋麦大量进口之前,上海机制面粉工业主要是从附近的苏、皖、浙等省获得小麦供应,这些省份小麦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也随着面粉工业产能的扩大而有大幅提高,如根据1930年的调查,江苏江宁地区的小麦生产商品化率高达90%,浙江镇海的小麦商品化率几近100%,安徽来安县的商品化率亦有60%^④。应该说,由面粉工业发展引发的国内小麦商品化生产及交易市场已经初步形成,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上海面粉工业逐渐减少国麦采购转而购销洋麦呢?

首先,与洋麦相比,国产小麦的生产技术低下,小麦品质得不到保障。我国农民习惯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于肥料孰优孰劣,大都茫然不知”,新式农具也在人均土地较少且地块分散的农业特征下,因价格昂贵难以普及。不仅生产技术落后,小麦品种也缺乏有效的改良,“我国麦种,大都品质混杂,缺乏改良。我国所产多为软麦,大率蛋白质缺少,麦胶因之而少,造成之面粉,最佳者仅列二等,制出之面包,又多不受人欢迎,在昔日无人竞争,对于品质,自无所选择,今则外货充斥,相形见绌。”^⑤由于灌溉、肥料

① 陈伯庄:《小麦及面粉》,第31页。

②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第150页。

③ 延伸:《最近我国之面粉业(下)》,《工商半月刊》1934年第6卷第15号。

④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30页。

⑤ 《吾国小麦问题》,《农学杂志》1923年第1卷第1期。

等现代农业技术和良种的缺乏,小麦产量大受影响,1930年代中国的小麦平均亩产量仅有133斤,个别地方甚至不及100斤,同一时期加拿大为162斤,英国可达267斤^①。不仅产量较低,小麦品质亦得不到保证,国产小麦的麦粒大小、淀粉含量、麸皮色泽常常因当年的气候、水土条件而有所波动,不同年份的品质差距很大,在品质欠佳的年份,面粉企业宁愿暂时停车歇业也不愿意磨制国产小麦^②。

另一方面,小麦品种改良工作收效甚微。早在1920年代初洋麦进口开始增长之时,就有学者呼吁政府当局关注改良小麦品种、改善粮食运销,然而迟迟未能引起政府当局的足够重视^③。东南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等机构也曾因为科研需要组织过小规模的小麦改良实验,并取得了一些增产的效果,但由于军政局势动荡,政府倡导不力,经费来源短绌,“实验研究之结果,未能发挥宏效”^④。直至1931年长江大水引发中下游地区的粮食恐慌,全国洋麦进口规模突破2200万担的历史最高点,政府才开始重视小麦品种改良问题。此后江苏、安徽、浙江等地陆续成立省立稻麦实验农场,进行局部的小麦改良工作^⑤。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又联合农村复兴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实业部等部门成立稻麦改进监理委员会,在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内设立全国稻麦改进所,负责全国稻麦改良的计划和实施工作^⑥,但很快全面抗战爆发,苏皖浙地区的小麦品种改良工作被迫停顿,纵观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小麦品种改良工作始终没能取得规模性的成效。

其次,国产小麦的运销费用高昂,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麦的地域优势。上海市场上的国产小麦,大都来自附近的苏、皖、浙三省产麦区,其中尤以江苏为最多。江苏各县运麦到上海,运输方式以轮船为主,火车次之,上海附近的浦东、宝山等县,也有用驳船运输的。因运输方式不同,运输费用也不尽一致,受内河航运条件限制,无法使用大型船只,运输过程中完全依靠人力,导致运麦进沪效率低下且费用高昂,如徐州、宿迁、众兴、窑湾产区的小麦每担运输费用平均1.20元,泗阳1.10元,南京甚至高达1.40元,其它如镇江、东台、阜宁、泰县、靖江、盐城、溱潼、天长、高邮等地平均都在0.70元左右,只有离沪较近的浦东、嘉定、松江、丹阳等地的运费较低,价格在0.20~0.50元之间^⑦。如果从苏北徐州、皖北蚌埠一带通过陆路运麦到上海,每担运费竟须1.40元至2.60元之多^⑧。从加拿大、美国采购洋麦运到上海,由于采用大型海运船只,每船可一次装货六七千吨甚至上万吨,反而成本低廉,每担运费仅需0.60元左右^⑨,澳洲小麦则更是低至0.44~0.50元^⑩。

除运费外,各地多不胜计的苛捐杂税也增加了国产小麦的运销成本。南京国民政府未实行裁厘之前,江苏有厘卡58处,浙江42处,安徽42处,沿途征收牙税、计捐、统捐、出口捐、警捐、公益捐、商团捐等各种正税杂捐,少则一二十项,多则三四十项^⑪。平均下来,从江苏丹阳运麦至上海,“每船(以载250担为准)捐税高达37.60~42.60元,自溧阳、金坛、江阴至上海41.60~46.60元”,距上海咫尺之遥的苏州,“每船亦须22.60元”^⑫。如此计算,每担小麦运抵上海的捐税成本在0.09~0.18元之间,江苏省内如此,安徽、

① 彭起:《论小麦新品种之重要》,《稻麦月刊》1936年第1卷第3期。

② 《今年新麦品质欠佳》,《中行月刊》1932年第4卷第6期。

③ 于矿:《上江苏省长提倡米麦品种改良意见书》,《中华农学会报》1921年“稻专刊号”。

④ 蔡旭:《近年来我国麦产改进工作概况》,《农业推广通讯》1944年第7卷第6期。

⑤ 陆国英:《我国稻麦品种改进工作概述》,《农业推广通讯》1944年第6卷第12期。

⑥ 《全国稻麦改进办法大纲》,《工商半月刊》1935年第7卷第17期。

⑦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江苏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第70~71页。

⑧ 国民经济研究所:《江苏之杂粮》,国民经济研究所,1936年,第25页。

⑨ 魏友棐:《小麦出口案与粮食的根本问题》,《钱业月报》1936年第16卷第9号。

⑩ 陈伯庄:《小麦及面粉》,第52页。

⑪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册),第283页。

⑫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35页。

浙江等较远的麦产区更无须赘言,时人感叹“如此细杂之捐税,及高昂之运费,农民虽欲亏本出售,亦岂可得?”^①不独上海周边如此,其它面粉工业中心城市也面临相同的困境,河北各县与天津仅一日路程,小麦运抵天津,运费和捐税相加,每担大约在2元以上^②。由河南郑州、信阳一带产区运麦到汉口,每担运费及捐税约1.70元,与加拿大、美国小麦运至汉口费用相比,竟然高出三倍有余^③。

由于运销成本过高,近代中国小麦产销的区域化特征明显。“各地所产之麦,大半只供本地消费,其运出外省销售者,实居少数”,例如陕西之麦,在陕西供过于求,虽然售价不及上海的四分之一,但由于运费高昂,“故无从以所余者济不足也”;又如汉口的面粉工业,常常因原料不足不得不暂时停车歇业,而临近的河南虽为产麦大省,往往无法济汉口之急^④。鲁北一带所产小麦,多输往天津,鲁南则多输往徐州,鲁西鲁中一带多集中于济南,胶济铁路沿线则集中于青岛,鲁东北一带集中于烟台,这些集中地多系面粉厂集中之地^⑤。由于运输困难,费用高昂,难以实现小麦的跨区域长途运销,导致面粉工业无法以比进口洋麦更划算的价格从周边省份获得充足的小麦原料,能够消化的国麦非常有限,每年全国小麦总产量中,仅有十分之一被产区附近的面粉工业收买为原料,其余多由农家或当地磨坊磨成粗粉^⑥。

最后,缺乏行业监管与质量规范,国产小麦含杂率较高。根据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我国各产区的小麦含杂率整体较高,黄河流域所产小麦中的杂物多为砂土,淮河流域多为杂草种子,长江流域多为灰土,具体而言,江苏省南部麦产区的含杂率为4.8%,江苏省北部4.3%,安徽省北部4.5%,湖北省5.9%,苏、皖、鲁、豫、冀、晋、陕、川、鄂九省麦产区,平均含杂率为3.3%,其中江苏徐州、安徽蚌埠、湖北汉口为含杂率较高的产区^⑦。

国产小麦含杂率较高,一方面传统的小麦生产方式所导致,由于缺乏现代脱粒机器,小麦收割之后农民多以传统手工作法完成脱粒,“内地打谷之法,多以禾棒敲击,或束缚为捆,而于木杓上击其穗,或用石轴压其发出之谷,常有秽物皮壳及其它外来物掺杂其中”^⑧;另一方面则是在小麦运销过程中,“中间经手之行商、贩户常常在麦中掺和泥沙,希冀加重份量,而谋不当之利”^⑨。这种杂质较多的小麦,在磨粉之前要筛选晾晒,需要耗费额外的人力、时间和财力,对面粉企业而言,无形中增加了不少生产成本。

上海福新面粉厂负责人荣宗敬在谈及国产小麦掺杂问题时曾无奈地表示,由于含杂率太高,面粉厂往往宁愿暂时停车歇业,也不愿收买这些含杂的小麦,常常是“农民虽折本求售而不得,面粉厂亦受困于无麦可磨,于双方均无益处”^⑩。以小麦运销为主要业务的上海杂粮业也深感国产小麦质量不高又大量掺杂是在竞争中输给洋麦的重要原因:“窃闻洋麦输入,不恤大笔金钱,源源外溢,此无他,盖实由于国产麦品之次劣,复加以乡农商贩,充泥掺假,以博蝇利,卒至面粉厂家,望而却步,反观洋麦货品既佳,又无潮毛杂质,是以无怪厂方之一致趋定洋麦,而敝履国产也。循是以往,不图挽救,粉厂几非洋麦无以开磨,国人非洋麦不欲采用,流水滔滔,何时可止!”^⑪

进入1930年代,洋麦低价倾销中国,本已萧条的国麦市场更加萎靡不振,影响民食与商业甚巨,粮

① 巫宝三:《中国粮食对外贸易其地位趋势及变迁之原因(1912—1931)》,第56页。

② 《河北省小麦之贩运》,《社会科学杂志》1930年第1卷第1期。

③ 《湖北省产麦滞销情形表》,《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933年第5期。

④ 蔡受百:《中国麦产及面粉业概况》,《国闻周报》1924年第1卷第4期。

⑤ 《山东之小麦》,《津浦铁路日刊》1936年第1638—1663期。

⑥ 蔡受百:《中国麦产及面粉业概况》,《国闻周报》1924年第1卷第4期。

⑦ 《国产小麦含杂量之研究》,《农报》1937年第4卷第15期。

⑧ 那安:《上海之面粉工业与中国之国外小麦贸易》,《建国月刊》1929年第2卷第2期。

⑨ 《水灾声中之民食状况》,《申报》1931年8月9日。

⑩ 《棉花掺水小麦和泥之改革谈》,《银行周报》1924年第8卷第1期。

⑪ 《杂粮业通告粮商改良国麦》,《申报》1933年5月28日。

食运销问题才引起了政府与行业相关部门的重视。1933年5月,上海市粮食委员会召集粮业、运输业等相关产业,商议取缔米粮掺水掺杂办法,决定对米粮掺杂掺水行为加大处罚力度^①。上海杂粮业也随即成立小麦组及小麦研究会,对于各产区运来小麦,须先审验合格,方可上市行销,并通告各省同业及商贩,转告农民“万勿于麦品之中,充水掺泥,以期彻底改革国麦质量”^②。然而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小麦运销过程中的掺杂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四、面粉工业过度依赖洋麦的检讨

近代上海机制面粉工业以洋麦代替国产小麦,虽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对稳定的优质原料供应的暂时需求,但与此同时,对洋麦的过度依赖也增强了自身对世界小麦市场的依附性,增加了机制面粉工业的外源性风险。1933年6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四个主要小麦出口国鉴于1920年代以来世界小麦价格不断下跌,各国损失巨大,为了阻止麦价继续下跌,四国拉拢德国、奥地利、法国、英国等国,召开世界小麦会议,谋求在小麦生产与价格方面采取一致行动。8月25日,参与各国签订国际小麦协议,一致同意自1933年8月起,不再扩大小麦种植面积,各国政府亦不寻求增加小麦产量;各国出口小麦的最大数额不得超过1931—1933年该国小麦平均收获量除去国内标准需要额以后的85%^③。国际小麦协议对小麦价格的影响立竿见影,接下来的1934年,世界小麦价格应声提高,美国各种品号的小麦价格普遍超过国产小麦20%~40%不等^④。

世界小麦市场的这一变动给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带来灾难性影响。在洋麦连连涨价声中,中国洋麦进口规模大幅萎缩,据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统计,1934年1—4月,中国共进口洋麦296万担,相较于去年同期减少了59.3%^⑤,上海各面粉工业1—3月产量仅为408万包,较上年同期下降53.5%,上海面粉交易所1—3月平均每月成交额也降至上年同期的51.5%^⑥。由于小麦供应不足,不少中小型面粉工业相继停车,只有少数大型企业勉强维持生产,但生产规模“平均约减去十分之六”^⑦。不独上海如此,济南、天津、汉口、徐州等处面粉工业,受此影响,均减工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不等。

由于中国进口洋麦占世界小麦供应总额比例较小,最高时仅有6.2%,多数年份连1%都不到^⑧,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的原料采购对世界小麦贸易格局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只能被动地接受世界小麦生产格局与 market 价格的波动。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受欧洲战事紧张和世界麦价上涨的牵累,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的这种窘况始终未能得到明显改善,面粉企业纷纷被迫停工,勉强维持开车的工厂,不及往常的30%^⑨。

检讨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困于世界小麦市场不能自拔的原因,首先是历届政府当局始终未能对1920年代以来西方对华小麦倾销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近代以来,囿于中外协定关税制度,洋麦进口一直执行“值百抽五”的低税率政策,除了缴纳5.0%的关税和2.5%的子口税之外,洋麦进入中国无需缴纳其它任何税款。进入1920年代之后,美、加、澳等国家解决本国小麦生产过剩的办法,正是利用了中国的低

①《粮食委员会讨论取缔米粮掺水办法》,《申报》1933年5月30日。

②《杂粮业整顿国产小麦》,《申报》1933年6月26日。

③《小麦协定全文》,《国际贸易导报》1933年第5卷第10号。

④徐佩琨:《民国二十二年麦业之回顾(下)》,《社会经济月刊》1934年第1卷第2期。

⑤《各国食粮进口大减》,《申报》1934年6月5日。

⑥延伸:《最近我国之面粉业(上)》,《工商半月刊》1934年第6卷第14号。

⑦《荣宗敬谈面粉价值衰落真相》,《申报》1934年5月11日。

⑧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8页。

⑨蒋乔坻:《面粉业的萎缩及其原因》,《中外世界经济情报》1937年第1卷第12期。

关税机制,加速形成了对华倾销态势。1925年10月,北京段祺瑞政府曾与西方国家谈判,试图实现关税自主,但随着次年7月段政府倒台,关税会议也无果而终,“洋货进口,沿习旧制”,洋麦继续以极低税率倾销中国,“任其自由竞争,漫无限制”^①。

1930年代初,洋麦倾销带来的国产小麦滞销、农民破产、粮食行业萎靡不振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以上海米粮业同业公会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团体就曾多次呈请政府禁止外洋小麦进口,“以保国家元气而维农民经济”^②。然而,成立未久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获得美国的财政支持,不仅未能对洋麦倾销采取管制措施,反而于1931年和1933年两次与美国政府达成900万美元麦麦借款协议和5000万美元棉麦借款协议,从美国大量进口小麦^③,进一步加剧了洋麦对华输入。直至1933年12月16日,在舆论的强烈呼吁下,南京国民政府才开始开征洋米麦进口税,将小麦进口税额定为每担0.3个金单位^④,但实行未久,随着1934年世界麦价进入上涨通道,洋麦进口大幅衰减,洋麦进口税不再具有实际意义。

其次是由于国内粮食运销缺乏区域整合,统一的国内小麦市场始终未能形成,上海面粉工业难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小麦供应。究其根源,约有以下数端:

第一是地方粮食保护主义盛行。民国以来,各地省、县政府,甚至当地驻军,稍遇粮食欠丰,往往以荒歉为托词,禁止粮食外运,“甚至乡区绅董,常自行限制”^⑤。尽管国民政府屡次通令地方,要求“国内米麦运输,省与省及县与县之间,应绝对流通,不得阻留”,“如各省米麦实感缺乏,必须禁运出境,亦应先陈明中央核定”^⑥,但由于民国以来地方势力尾大不掉,中央政令不通,地方省、县政府常常采取粮食保护主义,这使国内小麦流通常处于人为割裂状态。为打通小麦跨区域流通,1934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曾召集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产粮省代表,酝酿成立全国粮食运销机关,行政院还指示财政部联合中央银行、实业部、交通部、铁道部、内政部、农村复兴委员会等机关发起成立全国粮食运销局,用来协调解决全国范围内粮食调配问题^⑦,但因遭到各省地方政府以及粮食运销行业的坚决反对,最后不了了之^⑧。

第二是运输条件限制。近代中国,铁路运输并不发达,中西部地区的陕西、两湖地区、河南、华北等麦产区无铁路直通上海,如果说两湖地区所产小麦尚勉强可以通过长江水运抵达上海,那么陕西、河南、华北等地所产小麦则不得不依靠陆运或水陆联运才能到达上海,如前所述,陆运成本太过高昂,即便是运抵上海,也常常出现小麦价格高于面粉价格的倒挂现象。即便是毗邻铁路的产区,也未必能够充分利用铁路运输之便利,以安徽蚌埠为例,作为皖北小麦的集散地,每年可集中小麦十余万吨,而蚌埠车站每日沿京沪线发至上海的车辆,除去运煤以外,只剩下1500吨左右的运量,粮商托运小麦,往往需要等待两个月才能装车,经常因此错过市场行情,以至于不少粮商为争取时间,不得不改取成本更高的水运方式^⑨。京沪铁路沿线如此,其它交通不便的地区运麦的效率可以想见。显而易见,交通设施落后是制约小麦市场空间拓展的重要客观条件,时任上海面粉工业公会主席施复侯曾指出,解决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的原料问题,“有赖乎运输之便利,交通之发展者也”^⑩。

① 《定购洋麦之办法》,《申报》1932年12月7日。

② 《请禁洋米麦面进口》,《申报》1930年11月19日。

③ 魏尔特:《关税纪实》,海关总税务司,1936年,第318-322页。

④ 《洋米麦税起征》,《农业周报》1932年第2卷第50期。

⑤ 陈伯庄:《小麦及面粉》,第39-40页。

⑥ 《通令国内米麦流通》,《农业周报》1933年第2卷第6期。

⑦ 《粮食运销局总局设沪》,《农业周报》1934年第3卷第47期。

⑧ 《粮食运销局将缓办》,《中行月刊》1935年第11卷第3期。

⑨ 陈伯庄:《小麦及面粉》,第40页。

⑩ 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编:《茂新福新卅周年纪念册》,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1928年,第20页。

第三是贸易制度不良。国内小麦运销过程,市场层级和中间经纪较多。一般而言,小麦从农民手中出售,最终到达面粉生产企业,需要经过收买庄、转运商、牙行(粮行)、粮号、粮店等多级中间商,即便是面粉企业派人到产区直接采办,往往也要依靠当地行商居间联络麦贩,分赴乡间收买,并代为议价、验货与组织打包装运,整个过程中不仅产生行佣、庄客佣金、过斛费、转运费等采办费用,无形中也增加了时间成本^①。如此一来,“一省所产之麦,运之他省,转辗求售,中间几经重征敛税,运费尤巨,合之重于成本”^②。可以说,叠床架屋的贸易体系造成的流通效率低下,是内地小麦生产与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原料需求之间无法实现高效对接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洋麦进口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的原料来源结构,促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的规模扩张,但同时增强了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对世界小麦市场的依赖性。与此同时,政府监管在国内小麦生产、市场规范和洋麦进口等方面的缺位,进一步使上海机制面粉工业日益沦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附庸,这也成为1930年代上海机制面粉业衰落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胡文亮)

[参 考 文 献]

- [1]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 中国实业志(江苏省)[M].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 1933.
- [2] 巫宝三. 中国粮食对外贸易其地位趋势及变迁之原因(1912-1931)[M]. 社会调查所, 1934.
- [3] 章有义编.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 [4]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编.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 [5] 上海市粮食局编. 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 [6] 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编. 上海粮食志[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 [7] 许道夫. 中国近代粮食经济史[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0.
- [8]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8.

① 《上海商业习惯调查》,《社会月刊》1929年第1卷第7期。

② 顾鹤年:《中国面粉业概况》,《国际贸易导报》1930年第1卷第5期。